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德行、商业和历史

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

[美] 波考克 著 冯克利 译



西学 源流

德行、商业和历史

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

[美] 波考克 著 冯克利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行、商业和历史：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论辑 /
(美)波考克著；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9

(西学源流)

ISBN 978-7-108-04186-9

I. ①德… II. ①波… ②冯… III. ①政治思想史—
研究—英国—18世纪 IV. ①D0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7948号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 G. A. Pococ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中文版已获原著版权所有者授权

责任编辑 舒 炜

封面设计 罗 洪 崔建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9月北京第1版

2012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6.625

字 数 320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48.00元

西学源流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 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

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里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

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2006年元旦

波考克和他的思想史研究*

——以《德行、商业和历史》为例

(代译序)

冯克利

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界有两大新景观，一为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在中土的传播骤增，相关文献也被大量译介。其二便是以波考克、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和邓恩（John Dunn，1940-）等人为代表的所谓“剑桥学派”的引入。

大约言之，这两个思想派别各秉其教义，一为古典主义（或有人更喜欢使用的“古典保守主义”），一为共和主义，但它们的共同特点都不在教义的简易晓畅上，而是绕开传统上人们熟知的一些现代启蒙符号，如自由、人权、科学、进步等等，把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向着历史的纵深推进。这两派人分别以返回语境和反语境为分野，虽然都回

* 本文初稿是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暑期高级研讨班”（2009年8月11日-16日·北京昌平）上的讲稿。曾以“作为历史事件的概念”为题刊于《政治思想史研究》2010年第二期。这里我也要感谢我的学生傅乾在查寻部分文献中提供的帮助。

望历史，但看待既往的眼光却大相径庭。这也是他们之间有时大动肝火的原因。^①

施特劳斯一派学者以返回古典为号召，却是取历史文本为己用，旨在将政治思维重新定位于对永恒问题的追问与肯定上。他们多采用“以古观今”的眼光，用以对抗“历史主义”及其导致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剑桥一派学人虽然也着力从遭到后人轻忽的历史文献中发掘新义，却表现出相当浓重的历史主义倾向。借用我们传统国学的说法，这两派学者的差别，庶几类于“桐城”与“乾嘉”之分。一方执寥寥数函经典文本，用心于微言大义的解读和阐发，勇于肯定文本中不为时人所知的“本质”（它或好或坏，要看具体文本而定），志在推翻现代人从中无端衍生出的带有欺骗性的流俗话语。此派陈义甚高，却时常失之于学说背景的空疏。另一方则不相信有思想“欺骗史”的存在，视“文本能在一切时间欺骗一切公众”为无稽之谈。他们翻箱倒柜，重启大宗历史文献，运用修辞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方法重新加以细密的追踪与辨析，试图以新的视角尽力还原西方的政治学传统的本来面目。

这两派人马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渐蔚成大观，在英美学术界各领风骚。随着其文献的大量引入，国内关注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界也随之有所转向，认识向纵深发展，话语变得更加繁复深奥，令人对以往政治教科书中简单教义的宣示与推衍疑窦丛生。

^① 例如施特劳斯的大弟子曼斯菲尔德（Havey C. Mansfield, Jr.）与波考克的辩论，见其“Reply to Pocock”，*Political Theory*, vol. 3, no.4 (1975), 402-405.

一、“语境主义”和“历史主义”

在推动这一新趋势的发展上，波考克（J. G. A. Pocock，1924-）是十分有代表性的一员。他在这方面的贡献，除了大量的论文，^①可分别以他的三部专著作为标志。1957年他出版了成名作《古代宪法与封建法》^②，17年之后又有《马基雅维里时刻》^③问世，奠定了他在剑桥学派中的大师地位。晚年他更推出煌煌五大卷《野蛮与宗教》^④，力图通过对18世纪英国大史学家吉本的分析，深入揭示17、18世纪英国和欧洲启蒙运动的复杂话语背景。不过，与剑桥学派的另一领军人物斯金纳相比，他引起国内关注的程度却要少得多。^⑤

说波考克欲揭示一种“复杂的话语背景”，并非泛泛之

① 波考克的论文目录见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Ed. by Nicholas Phillipson and Quentin Skin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29-436. 1993年以后的论文目录见以下网站：<http://www.answers.com/topic/the-work-of-j-g-a-pocock>.

② J.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 rev. ed., 1987. 1987年的新版本中包含波考克在初版30年后写的一篇回应性和反思性的“回顾”，篇幅达原书一半。

③ *Machiavellian Moment*, 2nd edition with a new Afterword by the autho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s. 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2005. 按此书波考克计划写六卷，因此仍有一卷待刊。

⑤ 不知何故，与剑桥学派另一个大人物斯金纳相比，波考克在中国学术界颇受冷遇。斯金纳已有多部重要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两卷本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甚至有两个译本，而截止本文完稿时，波考克的重要著作和文集尚无一册中译本。有人曾用很夸张的字眼形容波考克等人的“共和主义学派”的兴起（“西方学术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产生了“强大震撼力”；“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等等。参见应奇：“迈向法治和商议的共和国”，载《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共和的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页。），然而除了有学者翻译过他的几篇文章外，对他的研究和讨论却十分鲜见。

言，而是有所特指的。所谓“话语背景”，或被批评者恰当称为“语境主义”（linguistic contextualism）的方法，^①不但为波考克所惯用，而且是其治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关于这种方法的来历，他在1994年霍普金斯大学的告别演讲中回顾自己治学经历，曾特别谈到他在1948年初次领悟到政治思想史研究所应采取的方向，应是“探讨特定时期的政治讨论和政治实践所能利用的言说和书写语汇，把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转化为政治语言的研究。”^②在2005年日本千叶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他又重复了以上说法，并且特别提及，是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于1949年重新编订罗伯特·菲尔默《〈论父权〉及政治著作选》^③一书，使他进一步明确了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把“历史上的政治写作纳入其语境”这一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因而将拉斯莱特此书视为“这一研究方法的起点”。^④这些表白中的“言说和书写词汇”、“政治语言研究”和“政治写作的语境”云云，正是波考克所谓“剑桥学派历史拟构”（Cambridge historiography）或“剑桥历史主义”

① Mark Bevir, "Mind and Method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6, No. 2 (May, 1997), pp. 168.

② J.G.A. Pocock's *Valedictory Lecture*, Presented at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4,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hn Russell-Wood (Baltimore: The Archangul Foundation, 2006), p.13.

③ Sir Robert Filmer, *Patriarcha and Other Political Works*. Ed. by Peter Laslet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9.

④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ambridge Moment: Virtue, History and Public Philosophy", 11-13, December 2005, Chiba University, Japan. 在本文讨论的文集中，波考克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拉斯莱特对菲尔默和洛克著作的编订，使包括笔者在内的另一些人，学会了赖以展开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历史框架。”见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

（Cambridge historicism）^① 形成其治学方法的核心。

用这种方法铺陈出来的思想史虽然变得极为复杂，但它的基本特点说来并无特别深奥之处。在波考克看来，一个时代的“话语背景”是由某些特定语言构成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当时人们观察和理解自己政治生活时的态度和立场，甚至他们的思想创新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身处其中的政治和宗教文化传统中的一些概念。因此，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的政治生活形貌，与这些语言和概念释放出的可能性有着难分难解的密切关系。

不言而喻，不自觉的思维方式或情不自禁的行为，最能反映人们真实思想，而最能代表这种不自觉表现的东西便是“方言习语”（idioms）。因此在波考克的著作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些被他选出来作为解释政治思想的字眼，如“神意”、“命运”、“习惯”、“末日启示”、“循环论”等等，而那些被后人所看重的学说，则被视为在这些复杂话语作用下的理论化结果。此外，这些词语或“词语丛”（clusters of words）会随着时光的流逝发生变化，只有通过考察它们的历史语境才能得到理解。不妨打个比方，按“科学”的一般定义，它是人类观察和认识世间万物的一套体系化的知识，但是这种定义却无法告诉我们“科学”在文化史中的具体表现和复杂作用，而只有透过后者，我们才能理解科学与不同

^①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Cambridge Moment: Virtue, History and Public Philosophy”, 11-13, December 2005, Chiba University, Japan. 在本文讨论的文集中，波考克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拉斯莱特对菲尔默和洛克著作的编订，使包括笔者在内的另一些人，学会了赖以展开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历史框架。”见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3.

文化群落的关系。例如“科学”在牛顿那儿是认识上帝如何创世的工具，在法国的启蒙运动时代可以成为对上帝失去信仰的贵族沙龙里满足好奇心的谈资，而在百多年前的中国，它却被国人理解为救世的利器；还有像“自由”、“进化”、“种族”和“传统”这类字眼的含义，在五四时代也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很大不同，有很多字眼甚至早已退出今天的政治辩论的主流。想想这些，当不难理解波考克的方法论对思想史研究的价值。

但是，这种方法论的特殊取向，难免会给阅读波考克带来不少困难。若不搞清楚这些深植于西方政治传统中的方言习语在波考克组织其思想史叙事脉络中的重要作用，读波考克的著作时往往让人觉得不得要领。^①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也正是这种利用当时的习语或修辞习惯来重建话语背景的努力，使波考克能够一再强调，他所从事的工作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更不是“历史拟构”（*historiography*）一词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编年史”，而是——用波考克本人的说法——指一种“宏观历史叙事的建构”^②。处理问题的方法使问题本身也发生改变，这是他笔下的政治思想史令人感到陌生甚至另类的一个重要原因。^③

在这种视角的观照下，恰当的问题便不再是前人给我

① 波考克常用这些习语作为其著作中一些章节的标题，例如《马基雅维里时刻》。以笔者的体会，深入理解这些习语的含义，是读懂波考克著作的前提。

② J. G. A. Pocock, *Machiavellian Moment*, pp. vii-viii, p. 559.

③ 英美学术界也有不少人认为波考克的著作不易读，参见耶鲁大学赫斯特教授（J. Hexter）的无标题长篇评论，载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6, No. 3 (Oct., 1977), pp. 306-337。另见 Larry Dickey, "The Pocockian Moment",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26, No. 1 (Jan., 1987), pp. 96-107.

们留下什么样的理论，而是他们的理论在什么环境中发生；不再是他们的理论中有哪些让今人感到可亲的东西，而是他们在面对解释、寻找或重建政治符号的挑战时，有哪些话语资源可供利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波考克在其成名作《古代宪法和封建法》中，步其师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消解“辉格党的历史解释”的后尘，阐述了17和18世纪一些英国人利用普通法重建自身历史的一种特殊眼光，即因波考克的研究而广为人知的“普通法心态”（the mind of common Law）的形成过程：当时的一批法律人为维护英国法治的连续性，用“古代宪制”具有“超出记忆的”悠久历史这种“历史拟构”，成功代替了永恒的神意和诺曼征服造成的断裂，从而给英格兰政体提供一种世俗化的令人信服的正当性解释——虽然它未必那么符合英格兰的既往历史。在《马基雅维里时刻》中，他又梳理出“大西洋共和主义”（Atlantic republicanism）和“公民人本主义”（civic humanism）的政治话语脉络，透过这种始于15世纪的佛罗伦萨、经由哈灵顿和清教徒移民的重新阐述传至美洲殖民地并对那儿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政治传统，讲述它为新诞生的政体提供正当性的一个艰难而又复杂的过程，由此开辟出理解英美政治发展的一片十分不同于传统的“洛克式权利解释”的视野。在《野蛮与宗教》中，他以爱德华·吉本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语境作为切入点，分析“蛮族社会学”、基督教的兴起与欧洲文明演进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此揭示启蒙运动反映着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在近代化过程中动荡不安的精神状态，以及推动他们在新历史条件下前行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紧张甚至对立，这使人们不再能把启蒙

运动理解成“统一的现象”，它不仅是一场离弃和反叛宗教的运动，更是“宗教争论内部的产物”，是一个由世俗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神学共同交织而成的历史事件。^①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面对复杂的话语世界，明智之举是不把思想的形成与发挥作用的过程描绘得过于工整（这方面的一例，清晰见于他对洛克的解释；见下）。当然，这也是运用波考克所谓“剑桥历史主义”的逻辑结果。这种“历史主义”既丰富了、也限制着波考克的研究视野，为理解乃至认可他笔下的思想史增添了许多困难。^②

就像语境主义一样，“历史主义”一向是个易于引起误会的概念。它既可导致被施特劳斯等人诟病的相对主义或特殊主义，又能走向黑格尔式的历史决定论和绝对主义。波考克等人的“剑桥历史主义”与这种一般理解的历史主义异同互见。以英人柏克和柯林伍德、德国的黑格尔、萨维尼和兰克及法国保守主义者迈斯特和今天的福山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③要么以“特殊的集体记忆”、“国民性”、“习俗”或“神秘命运”作为对抗普遍主义的手段，要么通过对“历史规律性”的认识将特殊性加以普遍化，故而被哈耶克称

① 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1, p. 9.

② 前引J. Hexter的评论就批评波考克在《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中有不少毫无道理的多余讨论，对思想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有意忽略也十分明显，最为突出的是在讨论17和18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时，他几乎没有提到霍布斯和洛克。

③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可参见波普《历史主义贫困论》，杜汝楫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关于德国的历史主义，有一本细致但有过度诠释之嫌的著作：伊格尔，《德国的历史观》，彭刚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福山著作的中译本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为“与真正的历史学家并无多大关系”。^①在这种多以“历史哲学”面貌出现的历史主义中，“语言”有时固然也是它所强调的文化要素之一，却不具有特别突出的方法论作用。波考克的历史主义同样认为一切思想都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此无所逃于彼时彼地的特殊问题，但他并不过多渲染内在于特定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神”（黑格尔意义上的“Geist”）和这种精神所展示出的因果性因素，而是以具体时空的语言所形成的“多重语境”作为中枢，进行跨文本的勾连与解析。在这种取向之下，历史主义所看重的歧异性和偶然性因素依然得到强调，决定论或目的论的“历史哲学”色彩却大为淡化。即以波考克所乐道的“共和主义传统”为例，它也并不特别具有“进步主义”或“历史规律”的意味，而更像一个在某种话语传统的作用下发生的偶然而又特殊的政治过程。诚然，对“历史主义”这类复杂的概念做出定义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在讨论波考克的“剑桥历史主义”时，对以上两种历史主义的区别给予格外的留意，还是有好处的。

二、方法及其运用

运用这种研究方法，使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何种具体面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下面姑以波考克的这本重要文集《德行、商业和历史》^②为例，来看看他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研

①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p. 384。

②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下面引用此书时，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究政治思想史的新视野。我所以选定此书，原因有三。

首先，收入该文集集中的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大体限于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一百年里英国的政治思想，相对于《古代宪法和封建法》和《马基雅维里时刻》两书，今天的读者对它讲述的内容更为熟悉，而且与我们当前仍然身处其中的现代社会有着更多的相关性，这使我们可以对它面对的问题有更深切的历史理解。其二，该书既包含对《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的核心问题——以马基雅维里和哈灵顿等人为代表的共和主义传统的曲折发展历程——在英国社会的具体表现的深入阐述，又有波考克后来的巨著《野蛮与宗教》中主题的预演，因此可为全面了解波考克的思想提供十分有益的帮助。《马基雅维里时刻》虽然有三章涉及共和主义思想在英格兰的传布，但以其叙事的脉络看，它只是对波氏早期著作《古代宪法和封建法》的赓续，算不上对这一主题的深入探究与辨析。第三，置于篇首的一篇晦涩的方法论长文，^①可使我们对波考克的治学路径有较深入的了解。

让我先从最后一点谈起。关于波考克的这篇方法论文章，首先应当给予关注的是他对“历史拟构”（historiography）一词的解释。对此我的理解也许有所偏差，不过大体上可以说：不清楚“历史拟构”这一概念的内涵，解读波考克也就无从谈起，对这个概念的一种独特运用几乎贯穿于波考克的所有著作中，它是使语境方法得以运用、历史主义观点得以贯彻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波考克的一种有别于研究方法的“政治史理论”。如果说传统的“历史”（history）

① 同上，“Introduction: The State of The Art”，pp. 1-36.

这一称谓没有在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学”和“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之间划出明确界线，那么“历史拟构”的使用则是为了刻意突出“历史写作的人为色彩”。

按波考克的解释，所谓“历史拟构”，如前所述，是指一种“宏观的历史叙事”。那么这种叙事的意图何在呢？它的一个基本作用，便是为表面上杂乱无章的世间现象赋予意义和方向感。面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人们需要通过对各种事件带有高度选择性的解释，重新确定道统和政统的连续性或断裂性，^①从而为自身的行为提供正当。近代社会给人带来的一大困扰，并不是它的变化（历史从来就不缺少变化），而是这种变化失去了以往由传统观念——神学的或自然法的——提供的稳定的解释基础。因此，如何重新理解和因应变化，甚至主动推动变化沿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就成了近代人绕不开的任务。

这种对“历史拟构”的解释，也许易于使人误以为它只是换了一个说法的“历史哲学”，但它的形成并不是哲学思维的结果，而是有着层次上比哲学低得多的来源，这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习语”、“修辞”或“话语”及其使用者。用波考克本人的话说，“一种历史拟构开始成型，有着典型的重心：首先是逐渐为人熟知、可以用来进行政治论证的各种‘习语’或‘语言’；……其次是作为历史角色的政治辩论的参与者，他们在不同的语言和另一些政治及历史背景下相互

① 中国有这方面很好的例子：《礼记》中的“改正朔，易服色”之说肯定政统断裂是君权建立正当性的要件；中国历代又有奉孔子为“素王”的传统，强调道统的连续性对政统正当性的重要。参见笔者2009年4月21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演讲“时间意识与政治行为”，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